

後設理論在國際關係學科中的認知與應用：

以 Morgenthau 與 Waltz 之理論版本為例

徐子軒

(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摘要

對於後設理論的陌生，是國際關係學界普遍的情形，而對於後設理論的誤解，則影響了國關理論的進步。為了改善這些問題，本文將先對於傳統的科學哲學進行系統性的分析與批判，繼而引介一個嶄新的科學哲學：理論版本，並做為國際關係理論的判准。不同於拉卡托斯(Imre Lakatos)式的研究綱領，理論版本不認為有所謂的硬核(hard core)存在，它比較偏向於孔恩(Thomas Kuhn)式的典範(paradigm)，卻進一步的避免了相對主義，其探討的科學現象在於理論和理論之間的變遷與繼承，以及理論家族之間的競爭。由此觀之，古典現實主義與新現實主義代表著兩個不同的理論版本，從通則到方法論，兩者都具有殊異的特徵；此外，新現實主義吸引了研究社群的投入，成為新一代的原型版本，也顯示了兩者分屬於不同的理論家族，並非是在現實主義架構下的典範轉移。

關鍵字：後設理論、科學哲學、理論版本、古典現實主義、新現實主義

壹、前言

在目前的國際關係學科中，實證論仍是基本的認識論思維，如國關理論常會使用一些理想化模型，但這些模型卻會引導出非現實或是錯誤的假設，這即是實證論的影響，讓許多行為學派的學者相信社會世界與自然世界並無基本上的不同。一些國關學者也相信國際體系與自然世界中的系統相似，故而，他們認同「歸納-統計」(inductive-statistical)模型或「演繹-通則」(deductive-nomological)模型，這些號稱可以成為「涵蓋律」(covering law)解釋的方法，亦適用於國關理論當中。因此在研究目的上，經驗主義(empiricism)的證實或是波普(Karl Popper)的證偽都可以用來作為追求「真實」的衡量標準。如此一來，則事實與價值必須做出區分，僅管所觀察到的事實都是主觀的，但這些學者依然認為世界的客觀知識是可能的，此乃因為他們將價值當作事實以進行研究，倡言價值中立與價值豁免，以科學的姿態掩蓋了理論的哲學部分，並直觀地將經驗主義當作國關學科的認識論，甚至是方法論，如此反會造成學科的退步。¹這是因為現實主義自 1970 年代由華爾茲復興以來，重新站上國關主流學派的制高點，甚至在某些部分同化了自由主義的分支：新自由制度主義，而在國關學界第三次大辯論後，產生了所謂的「新新綜合」(neo-neo synthesis)，讓新自由制度主義修正路線，成為結構現實主義的補充。這樣的發展隨即主導著北美的國關理論，縱使有後現代主義的雜

¹ Steve Smith, "Positivism and Beyond," in Steve Smith, Ken Booth & Marysia Zalewski eds., *International Theory: Positivism and Beyon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15-17.

音也被難以抗衡，更形成各說各話的局面。

究其根本，乃是在於理性主義各學派（現實主義、新自由制度主義等）在經驗主義/實證論的影響下不甚重視後設理論，這便使得國關學科的認識論定於一尊，拋棄了社會範疇中的許多變數（如文化、身分認同），更忽略了社會科學的獨特性。如此自然會影響整體學科的發展，亦即，理論的預測力與解釋力受限，讓國關理論始終無法出現定律。直到溫特（Alexander Wendt）以科學哲學中的「科學實存論」（scientific realism）做為其建構主義的認識論，成功的質疑了現實主義的實證論立場，使建構主義的研究蔚為風氣，國際關係理論至此進入新的發展，學科內涵也因此更為豐富。準此，若將現實主義視為是國際關係理論中的典範，那麼會發現冷戰時期兩極體系的穩固，是確認華爾茲結構現實主義地位的主因，儘管其他學派不斷向結構現實主義進行挑戰，華爾茲理論始終保有其主導性。直到結構現實主義無法預測冷戰突然和平結束，形成重大的反常，其典範地位當即受到重創，似已進入了所謂的科學革命時期，結構現實主義可謂「成也冷戰、敗也冷戰」，亦顯示理論深受現實世界所影響。

故本文認為，國關學界若要以科學哲學認識論對國關理論進行評價，則必須與科學哲學進行一場完整的對話，只批判或闡揚少數幾位科學哲學家的思想，不過是在重複西方六零年代就已開始的論戰而已。就學科的發展而論，任何科學想要進步（或稱改良）必定得透過哲學思辨的過程，在後設理論中探索未知的部分，再以科學方式進行研究，否定或是排拒科學哲學，都是不健康的觀點。因此，本文的目的乃是在於審視當代科學哲學中的重要概念，並以此回溯現實主義的科學史脈絡，試

圖探尋國關學科的本質，找出適合國關學科運用的學說，藉此拋磚引玉，讓國關學者們可以進行反思與再探。在第二節中，本文將介紹一個嶄新的科學哲學－理論版本，借著探討理論版本的內涵，對既有的科學哲學進行補充與再造；在第三節中，本文採用理論版本做為國際關係學科的「判准」(criterion)，觀察現實主義家族中的競爭與繼承，描繪現實主義理論版本之間的遞嬗；最後一節則是提出國關理論可能的方向做為代結論。

貳、「典範」之後：理論版本及其家族

國際關係學者大多忽略理解、或對後設理論(meta theory)消極以待。就影響最大的實證論而言，在本質上亦變成了一種方法論的允諾，並聯繫著經驗主義的認識論，引導出受一定範圍限制的本體論。此種思維深深影響著國關學科中的理性主義者，而成為當代的主流。²不過，這種實

² 例如理性選擇論在國關理論影響力甚鉅，乃是一種符合科學性的主流概念，但它仍存在著自圓其說的問題。經過許多演變迄今，某些理性主義者的論述已經注意並處理過去那些刻意遺漏的部分，例如身分或情感，這等於是整合理性主義與建構主義，將科學與哲學重新揉合。不過，即使理性主義做了修正，並不全然意味著能容忍建構主義或後現代主義的思維。一個有趣但帶有歧視性的比喻是基歐漢(Robert Keohane)對女性主義國關理論的分類，他稱之為好女孩(女性主義立場論)、小女孩(女性主義經驗主義)與壞女孩(女性主義後現代主義)：好女孩能旋即成為主流國關理論的一部分、小女孩具有這種可能性，但壞女孩則格格不入，參見 Cynthia Weber, "Good Girls,

證論也為支持後實證論的學者所詬病，特別是在瓦斯奎茲(John Vasquez)以「自然主義式」(naturalistic)的科學哲學詮釋現實主義理論，成功地質疑了現實主義的「典範」(paradigm)地位，逼的現實主義學派不得不挺身應戰，遂引起一場國關學科認識論的辯論。³但這場辯論幾乎全集中於拉卡托斯哲學在國際關係學科的應用，不啻是一味粗糙的套用理論，並用以攻擊對手。如基歐漢即認為拉卡托斯的科學方法過於嚴苛，如果完全按照這種概念與標準，將會全盤否定國際關係理論。故而，應以一種更柔軟的、更具解釋力的測定標準來替代拉卡托斯哲學(他將結構現實主義視為是研究綱領，而將所有的現實主義稱為是典範)。⁴格寧(John Gerring)更認為科學哲學建立在認識論的哲學層面上，純粹哲學的分析對社會科學方法論無疑是一種限制，因此波普-拉卡托斯(Popper-Lakatos)學派的思想無法提供社會科學進步的方法，也無法分別研究的好壞。⁵

在這場論戰之中，厄曼夫婦特別推崇拉卡托斯的科學研究綱領做為

Little Girls, and Bad Girls: Male Paranoia in Robert Keohane's. Critique of Feminist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Millennium*, Vol. 23, No. 2(1994), pp. 337-349.

³ John A. Vasquez, "Kuhn or Lakatos? The Case for Multiple Frames in Appraising IR Theory," in Colin Elman and Miriam F. Elman, eds., *Progres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ppraising the Field* (Cambridge: MIT Press, 2003), pp. 419-454. 在 1997 年的這場辯論中，大多數的現實主義者都接受拉卡托斯哲學做為學科判准，華爾茲(Kenneth Waltz)與厄曼夫婦(Elman and Elman)更特別為拉卡托斯的「部分」方法論背書，他們都認為瓦斯奎茲錯解了拉卡托斯哲學，也對現實主義的內涵不甚清楚。唯有瓦爾特(Stephen Walt)獨排眾議，主張拉卡托斯已經過時，勞丹(Larry Laudan)哲學更為先進，也較適合國關學科使用，參見 Colin Elman and Miriam F. Elman, eds., *Progres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ppraising the Field* (Cambridge: MIT Press, 2003).

⁴ Robert O. Keohane, "Theory of World Politics: Structural Realism and Beyond," in Robert O. Keohane ed.,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State Power: Essay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89), p. 37-38.

⁵ John Gerring, *Social Science Methodology: A Criterial Framework*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 17-18.

國關的方法論，⁶其理由如下：第一，他們認為拉卡托斯的研究綱領提供了一個理性主義及多元主義均認可的機制，也為多數國關學者所贊同，國關理論承認也容忍各種競爭的研究綱領，這正是拉卡托斯哲學所強調的。第二，拉卡托斯主張科學並非由單一理論組成，而是由一系列享有共同核心的理論互相連結而成，國關理論中無論現實主義、自由主義，抑或建構主義都經得起拉卡托斯哲學的檢驗。第三，科學研究綱領可以給予各學派一些具體批評的依據，亦即，科學研究綱領可以讓批評者應用，以審視一個理論保護自身的程度。第四，一些國關學者早已指出拉卡托斯哲學的效用，因此他的方法論乃為國關學界所知悉。但他們亦強調多數的國關學者對於方法論之涉獵並不深，也沒有針對科學研究綱領進行完整的瞭解，這些學者編書的目的正是要補足此項缺憾。⁷

上述的幾點理由立意良好，卻有一些對於科學哲學的誤解。首先，我們必須明白，科學哲學是在科學社群內思索如何解決常態科學中的爭議，這樣一來不僅排除了其他社會行動者參與其中的可能性，也輕視了社會運行對科學的影響。據此，既有理性與社會的區分便不能成立(更包括了拉卡托斯所區分的內部史-internal history 與外部史-external

⁶ Colin Elman, Miriam F. Elman, "Introduction: Appraising Progres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in Colin Elman and Miriam F. Elman eds., *Progres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ppraising the Field, op cit.*, pp. 7-10.

⁷ 至於現在是不是科學革命時期，各家看法不一，但可以肯定的是，現實主義已不能稱之為典範，或可用範例來看待之，畢竟它仍有眾多的信徒與一套信念存在。即便如此，當代的現實主義者大致仍遵循華爾茲理論，僅進行部分修正，表現出典範就像是「時代精神」(zeitgeist)，制約著科學家的研究。而來自於典範間的批評，大多數也都集中於華爾茲理論對兩極世界的構想、國家中心論、權力政治，以及忽略其他如跨國跨領域的發展過程，少有檢討或反思其認識論與方法論，參見肖鋒，石泉譯，Iver B. Neumann、Ole Wver 主編，**未來國際思想大師**（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 年），頁 18-23。

history)，各種科學的爭議也決計無法以一個普遍模式解決。換言之，在科學的實踐活動中，無論是典範(又稱學科基質、範例)或是科學研究綱領，往往都不能提供解謎的標準答案，因為政治、經濟、文化等因素都會型塑科學爭議，有時甚至會引導科學知識的走向，故常態科學下的解謎活動不能被稱做是完全理性。更有甚者，社會科學能夠依賴的知識極其有限，這是緣於人類所能儲存的可靠歷史極其有限，也只有少數規律能通過科學檢驗。以國際關係為例，幾乎沒有任何一個個別因素能單獨影響任何一個時代，也不可能光靠外在的國際體系影響國家行為，而忽略了一國內部的政治運作。於是，當能動者與結構緊密聯繫，互為主體地影響產生反饋，謎，也就更加諱莫如深，甚至，成為自我實現或自我否定的預言(self-fulfilling or self-denying prophecy)。⁸

又，將科學哲學應用在國際關係學科中則應該要瞭解到，現實主義與自由主義基本上都是從實證論的角度來理解拉卡托斯的研究綱領，而建構主義是屬於相對主義的範疇，乃是拉卡托斯曾抨擊孔恩的原因之一，如此怎能通過研究綱領的檢驗？也就是說，這些國關學者在引介科學哲學判准時，往往混用拉卡托斯與孔恩哲學：前者的科學研究綱領是相互聯結，且內在嚴密的完整系統，並不是各自為政的獨立理論命題；後者的典範則是龐大的宏觀結構，偏向於鬆散的研究傳統，兩者大不相同。這般粗糙的認知不應是著名學者們該犯的錯誤，有趣的是，厄曼夫婦自身已點出問題，卻仍見後續相同論述。⁹歸納之下只有一種可能，便

⁸ Daya Krishna, "The Self-Fulfilling Prophecy" and the Nature of Societ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36, No. 6(1971), pp. 1104-1107; Robert Jervis, "The Future of World Politics: Will It Resemble the Past?"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6, Issue 3(Winter, 1991-1992), pp. 40-41.

⁹ Colin Elman & Miriam F. Elman, "How Not to Be Lakatos Intolerant: Appraising

是他們將國際關係學科內的建構主義定義等同部分學者的理論，排除了厚實(thick)的建構主義者(傾向相對主義)，只承認淡薄的(thin)建構主義者(傾向後實證論)，如主張科學實在論的溫特。¹⁰但這麼一來，便違背了研究綱領的多元性，又回歸了認識論的一元論，亦凸顯了北美的國關學者希望透過話語的解釋，獨佔此塊知識領域，重現科學擁護者對後實證論的排斥與驕傲。¹¹

為了解決上述的問題，本文要介紹一個新的科學哲學觀點-「理論版本」(theory version)來重新審視並評價國關理論。何謂「理論版本」？其意義可以理解如下：

理論版本的定義是單個科學家所建構的「理論」，許多科學家擁有相似的「理論」則組成一個理論版本家族。透過這種「理論版本」的概念，我們可以將理論發展的考察置放到「微觀的」大科學家個人的「輸入和輸出」(input and output)的脈絡下，從而更明確地描繪出一幅科學知識發展、競爭與變遷的精製圖像。…簡單地說，理論版本就是個別科學家，針對某一「論域」(domain)所提出的一個獨特的「分疇分類與模型系統」，

Progress in IR Research,”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 46, No. 2(2002), pp. 238-241.

¹⁰ Alexander Wendt,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¹¹ 甚至，在建構性(constitutive)理論與解釋性(explanatory)理論之間，存在著難以跨越的鴻溝。兩派雖均在國關學界，卻不將對方視為是同行，原因在於後現代的反思主義者認為主流的理性主義者，對現存強制性的理論秩序應負有責任；理性主義則嚴厲批評反思主義是顛覆性的反科學思維。申言之，兩派之間的爭論不具對話基礎，一邊將理論性實踐定位為國際關係再生產或轉換的部分，另一邊則認為自己的理論超脫於現實之外。參見 Steve Smith, “The Self-Images of a Discipline: A Genealog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in Ken Booth and Steve Smith, ed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Toda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5), pp. 26-28.

加上用來呈現它的表達系統。¹²

理論版本不似波普或拉卡托斯的學說，並非是那種具規範性評價的科學方法論，它比較接近孔恩式哲學。事實上，理論版本的提出正是要取代孔恩所謂「典範精煉」(articulation)的理論面向，而後繼理論所組成的理論版本家族，則是要取代典範本身的理論面向，後繼理論與原創理論之間是一種前後相承的平行關係，不是上下垂直式的從屬關係。申言之，一個理論版本家族的元祖理論，又可稱為「原型版本」(prototypical version)，即是孔恩所謂的典範，也是他後期所定義的範例(sample)：一個理論家族中所共用的信念。¹³同時，原型版本能帶出後裔版本，顯示它亦具有啓發的能力，從這個角度觀之，似乎可以將原型版本視為是所謂的研究綱領。¹⁴做為此種綱領的形式要項主要有五種：原理或定律式的通則、模型分類體系、論域、自然哲學的學科分類與學科秩序，以及理論的目標、價值與方法論，前三者組成理論版本的基本結構，後兩者則是家族的聯繫紐帶。

在基本結構這方面，通則在傳統上即被認為是所謂的理论核心，是理論繼承(甚至是科學知識累積)的主要部分，許多後裔的理論版本，主要都是因為繼承了通則而被視為屬於該理論家族。模型是理論版本用來說明現象的主要工具，一個模型體系可以包括高層的抽象模型與低層的

¹² 陳瑞麟，**科學理論版本的結構與發展**(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04年)，頁101-102。

¹³ 範岱年、紀樹立譯，Thomas Kuhn 著，**必要的張力**(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頁306-307。

¹⁴ 周寄中譯，Imre Lakatos 著，**批判與知識的增長**(臺北：桂冠，2001年)，頁293-295。

接觸模型，都具有引導研究的功能。論域是科學研究的主題，如物件、歷程、行爲、事實等物件，構成了理論的分類系統，透過論域，研究者得以描述、說明和預測分類後的新世界。在聯繫紐帶這方面，研究者可能針對各種研究主題發展出不同的理論版本，也就是爲每個主題界定了一門學科，形成所謂的學科分類。而不同主題的理論版本間擁有某種關係或秩序性，使它們可以有序地構成整個自然哲學的理論版本，投射到學科分類上，就是建立了一種學科秩序。最後，每個理論版本都可能具有研究者個人對科學的目標、基本價值判斷，以及延伸出來的方法論規則，一個原型版本要吸引後繼者跟隨，必然要提供指導科學研究的理論目標、基本價值與研究方法論。總的來說，一個理論版本的通則系統蘊含了其模型體系，在模型體系中則預設了其主題的分類系統(論域)；此論域乃是更大論域(即自然哲學的存有論範疇，由學科分類與學科秩序所展示)的一部分，其範疇提供或限定了理論的目標與方法論規則，而這些又會反過來指導追求通則與架構模型。¹⁵

至此，我們已經初步瞭解理論版本的內涵，現在更重要的是，我們該如何透過理論版本闡釋科學理論的進步判准？在這一部份，理論版本依舊聚焦於各種理論之間繼承、更新、生成與競爭的過程，其中，競爭乃是最重要的功能，因爲有了競爭，才會產生科學變遷。不過，在理論版本中的競爭概念，並不同於拉卡托斯或勞丹的主張，¹⁶而是一個理

¹⁵ 陳瑞麟，**科學理論版本的結構與發展**，前引書，頁 170-174。

¹⁶ 前者認爲「新事實之預測」(prediction of new facts)及其印證爲進步或退步的依據，後者則視科學理論中的競爭乃是透過「解決問題」(problem-solving，源自孔恩的 puzzle-solving)以互爭長短，而拉卡托斯哲學更較勞丹哲學受到矚目，如一些政治學家特別看重新事實之預測，或是研究的豐富性(fruitfulness)，以這些判准來檢視理論是否可以通過科學假設。他們認爲理論至少應與世界的知識相符，而最好的狀況則是

論版本對另一版本提出批判，且競相啓發後繼版本。換言之，這種競爭乃是吸引繼承人，讓自己的理論得以持續並獲得更新的過程。至於如何判斷兩個理論進入競爭，則必須從以下三個條件認定(第一個條件為必要條件，後兩者則是充分條件)：一、主題條件：相互競爭的理論版本所處理的主題必須要有交集，而且它們對該主題亦須存有不相容的判斷，等於是論域間的對立；二、批判條件：理論與理論之間應存在批判的態勢，相互批判即意謂著競爭，這存在著兩種可能，一為兩個理論版本(或家族)的直接對抗，二為混血理論之間的競合，即如果一理論家族中的成員借用了另一家族的資源來修改或建立自己的理論版本，而為原本家族成員所反對，則兩個家族亦可視為進入競爭；三、生成與繼承條件：兩個理論版本(或家族)即使沒有互相批判，但在某一時間內，各自吸引新的科學理論進入其範疇，形成兩個在形式要項上互不相容的學派，即為一種家族繁衍的競爭。¹⁷

由此觀之，從前理論競爭的結果，或稱科學革命，或稱問題轉移。但在上述理論版本的認知下，這種理論變遷的傳統意義也獲得了修正，可以分作兩方面理解，一為理論版本家族內部的變遷結果，二為一個理論家族變遷到另一理論家族的結果，前者偏向理論間的繼承，後者則偏向理論間的發展。易言之，理論變遷的重點，不在於以所謂的「解題進路」(puzzle-solving approach)著手研究，而是以傳統進路(結構化的理論，即理論版本)來進行探討：前者囿限於一定的規則，必須在典範下針對當

可以達到拉卡托斯所謂的新奇預測，也就是觀察到前所未見的事實，參見 Gary King, Robert O. Keohane and Sidney Verba, *Designing Social Inquiry: Scientific Inference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p. 12.

¹⁷ 陳瑞麟，*科學理論版本的結構與發展*，前引書，頁 184-186。

前的問題進行解答；後者則不限於既有的規則，只要是能夠找出答案的方式均可被接受，更進一步來說是跳脫了先解謎才能架構理論的思維。誠然，「解題」是科學研究的充分和重要特徵，但「理論」既是針對解題而被建構，則理論必然涵蓋瞭解題，因此直接討論理論更為適當。在下一部分，本文將以現實主義為例，先刻劃出其在科學史中的完整圖像，輔以考察不同時期理論版本之間的競爭，解釋現實主義的理論變遷。

參、 現實主義的兩種理論版本

一般而言，現實主義學派均將休昔底思(Thucydides)對於「伯羅奔尼薩斯戰爭」(the Peloponnesian War)的研究論述做為現實主義的起源。但在歷經兩千五百年後，現實主義方由一群學者領軍研究，逐漸成為一門制度化的學科，這些學者被稱為「古典現實主義者」(classical realist)。當中最有影響力的則莫過於摩根索(Hans Morgenthau)，其著作 *Politics Among Nations*(以下簡稱 *PAN*)引領了國關理論發展逾二十年之久。其後則由華爾茲繼承並提出獨特的「新現實主義」(neorealism)，從其著作 *Man, the State and War*(以下簡稱 *MSW*)到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以下簡稱 *TIP*)，華爾茲揭示了兩個目標，用以區隔他的版本與古典現實主義版本。其一是核心觀念的共同部分，如理性主義、國家中心論等概念，另一是強調兩者之間的差異性，如研究途徑、分析層次等。本文將以這兩人做為兩個現實主義版本的代表人物，由於這兩人對於現實主

義理論的發展影響甚巨，幾乎所有的現實主義或多或少都受他們的影響，因此將之當作其學科秩序並不為過（摩根索版本做為古典現實主義的學科秩序，而華爾茲版本做為新現實主義的學科秩序）。另外，由於現實主義理論探討的議題甚多，在一篇文章內完全討論殊無可能，我們只能選擇一項最為核心的議題：權力政治，再分別就其通則、模型、論域，以及目標與方法論四個形式要項進行討論，以區別兩個現實主義的理論版本（關於這些討論將彙整於下表 1）。

一、 通則

古典現實主義認為行為者的主觀判斷在建立（或重建）體系中有著決定性的影響，國家的主觀行為將牽動著國際關係的變化，唯一能證實這些概念的方法，是由政治家或是分析家依據特定環境進行解釋，這就是「主觀主義」(subjectivism)的應用。如摩根索旨在建立符合哲學架構的科學理論，其問題意識包括國際政治中的道德、國際法的分權(decentralization)、國際組織的接納程度、涉外事務的內部控制，以及外交的未來等。很明顯的，古典現實主義強調依靠個人的判斷力，並主張如果拘泥在某些嚴格的驗證標準上，將有害於對國際關係的解釋。相對於實證論的科學性，它呈現的是一種感知或直覺的研究過程，但在華爾茲看來此即是所謂的「還原主義」(reductionism)，即是欲以部份現象來解釋整體，他並抨擊，古典現實主義對於主客觀性未做區分，造成紊亂的解釋，若要瞭解體系則是必須從理論上著手，分析客觀的社會事實，

如此才能匯出符合科學的通則。¹⁸

由此出發，華爾茲主張以「結構主義」(structivism)做為理論的通則，他認為理論研究的合適物件並非只是體系的部分，也不是各個部分的外在關係，而是獨立存在的客觀實體，這些客觀實體則形成了體系的組合。在華爾茲看來，影響國際關係最重要的自變項是系統的結構，即單元行為者如何在系統中排列與定位。這種客觀結構也決定了體系的實踐意義，雖然他也承認行為者可能會出現多樣的類型，但他的理論只聚焦於在結構內具有重大影響的行為者，也就是強調能力的分殊性。¹⁹在這裡華爾茲特別指出他的結構保留了最低限度的實質部分，即是單元行為者的相對地位和關係，國家會因為權力不同而在國際體系中有著不同的地位。此即與古典現實主義強調的國家特性不同，因為能力是國家的特性之一，但能力分配卻不是國家的特性，而是屬於系統的概念。在發展此一通則的過程中，華爾茲採取的是一種「整體主義」(holism)，反對古典現實主義的「個體主義」(individualism)，同時也反對辛格(David Singer)式的次體系理論。他的理論在於揭示國際客觀結構，結構能夠限制或安排國家行為的主體性，這種限制和安排導致了結構的再造，並促使行為體與結構的要求一致。²⁰

此外，古典現實主義並未視其理論內涵或政治秩序是永恆不變的，也不認為兩者是既定的(given)公理。相反地，它認為需透過個體與集體

¹⁸ Kenneth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Reading: Addison Wesley, 1979), pp. 62-64.

¹⁹ *Ibid.*, pp. 79-81.

²⁰ Barry Buzan and Richard Little, *International Systems in World History: Remaking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 39-41.

的理性過程，才得以建立理論的主觀性及秩序。在政治秩序中，締造、維持與轉換規則的方法乃是依託於理性。對摩根索來說，描述一國政治家的外交決策，可以呈現出所謂國際政治中的理性(rationality)，因為政治家並非恣意行事，而是應按照國家利益決策，各種的對外政策是該國文化整體不可分割的部分，反映了其文化理論與實踐，故唯有透過分析哲學才能理解。但他發現 17 至 18 世紀的理性主義影響現代政治極深，更結合了啓蒙時代的科學主義，使得部分學者（自由主義者與馬克思主義者）認為社會科學可以與自然科學類比，社會世界與物理世界皆可透過同樣的理性過程分析。在摩根索看來，這些觀點既沒有理解人的本質，也沒有理解世界的本質，最終也未能理解理性的本質。實際上，理性會被利益等非理性力量牽引，並非如自由主義的科學學派認為，世界政治的脫序只是因為缺乏理性，可以透過引導使得人們走向良善。是故，摩根索主張必須在理性與非理性力量間建立一個有利於前者的態勢，那即是國家利益至上的權力政治。²¹

相較之下，新現實主義在此通則上顯得較為複雜。基本上，實證論關於理性在本體論上的意涵，都可以在新現實主義者的學說中窺見，從辛格的層次分析到華爾茲的 *TIP*，他們均假設國家如同「原子論的單元」(atomistic unit)，國與國之間的互動便似撞球(billiard-ball)的模型，由此

²¹ Hans J. Morgenthau, *Scientific Man vs. Power Politics*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46), pp. 2-3. 由此觀之，古典現實主義所主張的理性與當時所謂的「理性主義」(rationalism)確有不同之處。傳統對於科學的解釋，會匯出一種局限知識的理性主義，因此 Morgenthau 認為唯有現實主義的理性，才得以在國際關係中獲取知識，此種理性途徑能處理在社會世界裡大量出現的偶然性問題，形成了古典現實主義所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特別是他在 *PAN* 中從行為者的視角「重建」了理性，並以此理解對外政策。

可以觀察出運作的規則以及可預測的結果。如此的假設能使國際社會的本質具體化，但卻也因之排除了其下的結構與一些因果機制，以及社會構成的過程。此外，華爾茲對待理性的態度也十分值得探討，從他的邏輯觀之，在國際競爭與選擇極少的結構限制下，國家行為者的理性似乎是多餘的，但他也主張體系內的這些單位當然可以按照「意願」採取行動。不過，行為體因為對成本敏感，所以它們將會按照「理性」行動。也就是說，華爾茲認為即使借助理性假設，僅從國家利益出發，亦無法預見國家的政策，這是因為他強調領導人不可能理性地精確計算以做出決策，在此華爾茲與摩根索做出了重大的區別。²²這不僅是對於人性的懷疑論，更是科學化理論的必要改革，但這是在模型與方法論上的爭執，並不涉及通則的整體性。因此，我們仍可視古典現實主義與新現實主義的理論版本均包含了理性主義的要素。

二、 模型

討論完通則後，接著就是其蘊含的模型。首先，讓我們先就古典現實主義的模型著手分析。在 1930 年代，摩根索為了終結國際間蔓延的理想主義法治思潮，借鑒了心理學家 Freud 的理論，建立一種 Freudian 式的人類學 (anthropology) 做為其現實主義版本的內涵：自我保存

²² Kenneth N. Waltz, "Reflections on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 Response to my Critics," in Robert Keohane ed., *Neorealism and its Cr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 330-331.

(self-preservation)的動機即是 Freud 所謂的自我本能(ego instinct)，而自主(self-assertion)的動機則是所謂的性本能(sexual instinct)。在這個前提下，摩根索的人性有著兩種特徵，第一、人的本質是自私的，自我保存之目的乃是為了生存或繁衍；第二、對於權利的渴望驅動著人的行為，自主之目的是為了追求懷有敵意的支配(animus dominandi)，人類（或國家）因此爆發衝突與戰爭。²³其餘的古典現實主義者如卡爾(E. H. Carr)、李普曼(Walter Lippmann)、肯南(George Kennan)等之著作，也都可以見到這種由人性出發來論定國家行為的思想。²⁴

從人性出發，隨之進入了古典現實主義的第二個主要模型：權力是國家追求的目的。摩根索強調，無論是國際政治，抑或任何層次的政治，其目的都是為了爭奪權力，而且基於理性的考慮，政治家（與其國家）都會試圖擷取更多的權力。由是觀之，人類之間或是人與社會之間的衝突不啻是與生俱來的，古典現實主義以此延伸解釋國與國的衝突，人類與國家一直受本能驅使，國際政治也就不斷地重複這種迴圈。他並主張，任何國內的或是國際的政策，如尋求保持權力（維持現狀的政策）、增加權力（帝國主義），或是行使權力（提升威望的政策），都可以在其中見到權力的鬥爭，這也是一種由古至今的普世現象。²⁵

對於人性，新現實主義者華爾茲有著相似的觀察，他也提出所謂的「第一意象」(first image)即是根植於人性，戰爭來自於人的自私，而輕

²³ Hans J. Morgenthau, *Scientific Man vs. Power politics*, op cit., pp. 164-165.

²⁴ Robert Schuett, "Classical Realism, Freud and Human Nature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History of the Human Sciences*, Vol. 23, No. 2(April 2010), pp. 21-46.

²⁵ 李暉、孫芳譯，Hans J. Morgenthau 著，*國家間政治：為了權力與和平的鬥爭*（海口市：海南出版社，2008年），頁 35-36、59-60。

率的侵略念頭則是人的愚行。²⁶不過這並不代表華爾茲同意古典現實主義的公設，相反地他認為純粹的人性是非常難以理解的，人性不只受其本質影響，亦會受其身處的環境影響。所以對於人性的定義將會變化無常，無法獲得一種有效的社會性或政治性論斷。²⁷換言之，華爾茲雖相信人性是導致戰爭的一個重要因素，但這種推論不符合他認定的科學標準，亦即，人性無法檢驗，亦無法證偽，故不符合科學的要求，自不能成為強而有力的理論基礎。因此他主張結構的制約，即國際無政府(anarchy)狀態，使國家（及其人民）為了生存，必須採取一些措施以保護自身安全。²⁸

至此，又進了新現實主義的第二個主要模型：安全是國家追求的目的。根據新現實主義的邏輯，國家間的鬥爭是源自於無政府狀態下的兩種情況：一為國家在無政府的國際秩序下必須要提供自身安全；另一為國際間處處充滿了對國家安全的實際威脅或表面上的威脅。因為國際間缺乏最高的權威，自助(self-help)遂成了國家行動的準則，華爾茲並認為國家若要能保障其生存，最重要的措施就是在於累積足夠(sufficient)的權力。亦即，新現實主義將權力當作是一種「可能有用的手段」(possibly useful means)：較小權力的國家可能會招致攻擊，增加權力則可以嚇阻敵手，而最強的國家往往會讓其他國家感受威脅，進而導致軍備競賽與聯盟共同抗衡。故，敏銳的政治家會尋求適當而非無限制的使用權力。²⁹

²⁶ Kenneth N. Waltz, *Man, the State and War: A Theoretical Analysi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1), p. 3.

²⁷ Kenneth N. Waltz, *Man, the State and War: A Theoretical Analysis, op cit.*, p. 166.

²⁸ Kenneth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 91.

²⁹ Kenneth N. Waltz, "The Origin and Prevention of Major Wars,"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 Vol. 18, No. 4(Spring 1988), pp. 616, 619, 624.

在第一意象（人的本性與行爲）對決第三意象（國際政治環境）與國家目的兩個模型的爭辯中，華爾茲雖同意了摩根索的一些觀念，但卻並非照單全收，而是在其理論基礎上反復鑽研，企圖找出不合當代科學之處。藉由對於行爲主義的致敬，華爾茲打破了摩根索版本強調人性對於現實主義，乃至於整個國關理論所形成的思想制梏。³⁰基本上，古典現實主義和新現實主義都認為國際政治是爲了權力而爭鬥，但後者不同意這是由於人性使然，而是無政府的結構所致。根據安全極大化的考慮，如果國家察覺到危險，它可能會放棄獲得額外的權力，這代表著國家在權力平衡的狀態下，並無意使相對權力極大化，這些差異都顯示了兩個版本在論域上的相對性。從上述兩個論域出發，旋即就會進入下一個現實主義的論域：權力平衡。

三、 論域

普遍來說，社會科學的論域相當廣泛，可以從提供細密區別的微觀層次分析，一直到整合大規模變數的宏觀分析。就古典現實主義的權力平衡觀之，顯然是座落在人性與國家這個層次分析上，再以這種分析反映出國際的權力平衡。如摩根索即認為唯有當體系中每個國家的權力在最適的位置，才能達到所謂的均衡(equilibrium)，想要成功的達到權力平衡，就必須依靠精確的計算國家力量，也就是以國家特性來解釋權力平

³⁰ Kenneth N. Waltz, *Man, the State and War: A Theoretical Analysis*, op cit., p. 79.

衡。雖然摩根索在 *PAN* 中對於權力平衡有著四種解釋，但他也特別強調權力平衡是一種「普遍準則的呈現」(generalized principles of conduct)。從這可以發現他將權力平衡當作是一種國與國政策互動下的狀況，如此既包含了國家的行爲，也包含了國際的情勢。³¹對於摩根索的理論，華爾茲批評其立論邏輯嚴重錯誤：首先，摩根索把國家行爲的結果當作動機，還試圖從結果中找出規則讓國家遵守。換言之，權力平衡端賴各國的認可才能發揮功能，這顯然不符歷史經驗，華爾茲更特別強調只要有兩個國家努力在無政府狀態下求生存，就會出現平衡。再者，如果依照摩根索所言，權力平衡只有每個國家都追求權力的情況下才會出現，那麼只需研究國家的特性便足以解釋國際政治。如此一來，權力平衡就變成了一種現象而不是理論，研究焦點也將從理論的解釋倒退至陳述的階段。³²

可以想見華爾茲對於這種情形相當不滿，因此，他在 *MSW* 內便試圖針對從微觀到宏觀的三個意象進行結合，在行爲主義的框架下整理古老政治哲學的發現，謀求在新的社會科學觀與舊的思想傳統之間架起一座橋樑。儘管他曾強調第一意象和第二意象（國家的內部組織）是國家行爲者的驅力，也是形塑世界政治的動力，但若沒有第三意象，就無法評估前兩者的重要性或預測其結果，顯示華爾茲終究還是做出了選擇。是故，在他後來撰寫的 *TIP* 內，已徹底的轉向了強調結構的系統理論，從霍布斯(Hobbes)的無政府邏輯出發，希望能提供一種現實的途徑，避免古典現實主義者將國家在世界政治中的不道德（或非道德）行爲，歸

³¹ 李暉、孫芳譯，Hans J. Morgenthau 著，**國家間政治：爲了權力與和平的鬥爭**，前引書，頁 203-205。

³² Kenneth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op cit.*, pp. 120-121.

咎於人類與生俱來的本性。因此，華爾茲除了吸收古典政治思想家的學說，更希望以自然科學方法的精神，借用經濟學模型來解釋權力平衡這個存在已久的概念。

對華爾茲來說，影響權力平衡的因素除了無政府狀態之外，尚有所謂的極性(polarity)，他認為極性足以改變系統的結構，而且當結構改變，系統內的構成員也會受到影響。他的權力平衡觀不但強調兩極(bipolar)較多極(multipolar)穩定，更主張在兩極體系中雙方陣營的合作益顯重要。³³這也是跟摩根索不同之處，古典現實主義較注重系統與國際社會的劃分，透過這種劃分可以知道國際政治如何在傾向敵意或是合作的權力平衡運作。若是前者，國與國會以對抗的姿態促進本身利益；若是後者，國與國則會彼此合作以保全國際社會，顯示這仍是以國家為主導方向。另外，摩根索從歐洲協調的歷史經驗中得到啟發，主張多極較兩極穩定，這是因為多極體系中充滿了大量的不確定，因此各國領導人會更謹慎行事。不過，隨著世界邁入冷戰時期的美蘇兩極體系，摩根索也修正其觀點，原則上承認兩極較多極更穩定。³⁴從權力平衡的定義、內涵到運作方式，在在反映了兩人在此一論域上的歧異。即便學界大多認為權力平衡是現實主義理論中相當顯著的特徵，但透過比較分析之後，我們可以說新現實主義並未完全繼承古典現實主義，而是將其改良，以科學理論化的角度與符合當時世界現象的兩極，超越了古典現實主義的侷

³³ *Ibid.*, p. 118.

³⁴ Richard Little, *The Balance of Power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Metaphors, Myths, and Model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 254-258.

限。³⁵

四、 方法論

最後，讓我們進入現實主義方法論的探討。1960 年代，在社會科學中風行的行為主義革命，也開始轉向國際關係學科，所謂的行為主義學者在方法論上大肆推動經驗性的科學研究，要挑戰位居主流的古典現實主義。大量邏輯實證論與演繹-通則模型論據的出現，明顯針對古典現實主義所主張的「歷史脈絡化」(historical contextualization)與奠基於人性研究的規範性理論。對此，摩根索則堅守歷史-政治的解釋途徑，這種研究方法乃是源自於韋伯(Max Weber)的「理解社會學」(Verstehende Soziologie)，即以所謂的「理型」(ideal-type)解釋在社會科學中的方法論問題，可視為是「歷史科學」(historical science)的概念化。³⁶亦即，摩根索認為社會科學的方法論並非在於尋找普遍性定律，而是在於建立部分且為單方面(one-sided)的理型，因為理型只是一種理解實體的理論工

³⁵ Ole Wæver, "Waltz's Theory of Theor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23, No. 2(June 2009), pp. 209-210.

³⁶ Stephen Turner, "The Importance of Social Philosophy to Morgenthau and Waltz," in G. O. Mazur ed., *Twenty-Five Year Memorial Commemoration to the Life of Hans Morgenthau* (New York: Semenkeno Foundation, 2006), pp. 175-177. 總的來說，摩根索所提出的政治現實主義六原則，使他成為現實主義科學研究途徑之父，如在第一條原則中，他揭示了政治是由根植於人性的客觀法則所支配，這些法則是永恆不變的，因此存在著可能性，推導出一種合適的理論來反映這些法則。此反映了摩根索做為一個實證論者的態度：信念是基於人類的感覺，唯有當我們理解事實，才能賦予事實意義。再者，這也點出摩根索學說的主軸（即人性），在永恆不變的基本立論下，試圖提供了一個科學的客觀法則。

具，並非代表整體的聚集。職是之故，華爾茲認為古典現實主義的歸納法研究途徑並不足以充當國際理論的科學基礎。對他來說，理論是一種解釋政治的工具，而且可以限制或主導政治行動的範圍，同時亦將其他的政治部分連結起來。³⁷易言之，華爾茲想要建立的是一種「巨型理論」(grand theory)，他強調摩根索的學說充其量僅提供了理論的要素，但不能夠構成科學性理論，因為他只能處理部分的問題。此外，華爾茲也主張理論是無關歷史的(ahistorical)，且更要從歷史的細節中解放出來，他批評摩根索的歷史途徑將會被一些突發的或不可測的狀況影響，使其理論失去有效性。³⁸

直到 1970 年代，古典現實主義在內外都飽受挑戰，在外部有著以基歐漢、奈伊(Joseph Nye)領軍的自由主義，他們以權力相互依賴的概念，較古典現實主義更精準地描述了世界政治的樣貌；在內部則有凱普蘭(Morton Kaplan)、德意志(Karl Deutsch)等學者企圖以符合科學化的系統理論取代古典現實主義，不僅希望能繼承現實主義，更期許能復興現實主義理論版本家族，而這個目標則是在華爾茲手中完成。華爾茲認為歷史途徑將會使理論失焦，因此他放棄了古典現實主義由內而外(inside-out)的方法：外交政策是源自於個人和國家層次，人性、利益的計算、領導風格、國家特性，以及其他國內政治因素驅使決策。相對地，新現實主義者認為，國家行為是由國際權力結構與國家在系統內的相對位置所引導，不能從單元或次單元層次進行研究。是故，華爾茲主張要以高度抽

³⁷ Kenneth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op. cit., p. 8.

³⁸ Kenneth N. Waltz, "Realist Thought and Neo-Realist Theor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44, No. 1(Spring/Summer 1990), pp. 24-26.

象的觀點取代僅是描述，甚至類似軼事(anecdote)的歷史研究。³⁹這代表著華爾茲既繼承了擁有雋永傳統的古典現實主義，並在其上發展出他的新版本，又替代了古典現實主義，轉而成爲現實主義家族中的原型版本。

總的來說，在華爾茲學術生涯的早期可見其對於傳統政治理論的偏好，而在後期明顯成爲科學主義研究途徑的信徒，在 *TIP* 內，我們可以見到這種複雜的變化。不過，需注意的是，儘管華爾茲早期曾一度推崇經驗主義（在國關學界中可以行爲學派稱之），但後來他漸漸察覺到經驗主義的缺失。就認識論而言，他認爲經驗主義不只是一要「證實」理論，更表明了理論化是無所不在的活動，但事實上，大部分理論的狀態卻是很不明確的。⁴⁰尤有甚者，缺乏理性的經驗主義認爲，知識可以透過歸納法漸進累積，但使用歸納法只能觀察體系的部分行爲，不似演繹法能找出體系中各個部分的關係。也就是說，這些崇尚經驗主義的行爲學派（如上述的 Kaplan 和 Deutsch）並沒有建立無法觀測整體結構的運行模式，在華爾茲看來亦是還原主義式的系統論，這在某種程度上，與華爾茲攻擊摩根索的研究法是類似的。而華爾茲的系統論不僅取代古典現實主義的歷史研究法，也動搖了當時行爲學派的主導地位，以自己主張的科學方法修正並補救現實主義所遭遇到的窘境。⁴¹

³⁹ Barry Buzan, Charles Jones and Richard Little, *The Logic of Anarchy: Neorealism to Structural Realis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 240-241.

⁴⁰ Kenneth N. Waltz, "Political Philosophy and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W. T. R. Fox ed., *Theoretical Aspect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diana: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1959), pp. 54-55.

⁴¹ 倪世雄，*當代西方國際關係理論*（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1年），頁 120-122。

表 1 兩個現實主義理論版本的比較

形式要項	古典現實主義 〈權力政治〉	新現實主義 〈權力政治〉
1. 學 科 秩 序	摩根索版本	× 華爾茲版本
2. 通則	主觀主義	× 結構主義
	理性主義	→ 理性主義
3. 模型	第一意象(人性)-第二意象(國家)	△ 第三意象(無政府體系)-第二意象(國家)
	國家的目的：權力	△ 國家的目的：安全
4. 論域	權力平衡(多極)	△ 權力平衡(兩極)
5. 目 標 與 方法論	古典研究途徑：政治哲學、歷史分析	× 系統研究途徑：國際層次分析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圖案說明：→代表大致相同、△代表部分相同、×代表完全不同。

肆、代結論：國關理論的新方向？

在以理論版本檢視現實主義之後，我們已經知道新現實主義在通則上就反對古典現實主義的公設，之後在模型、論域與方法論上都理所當然的有著不同的假定，顯示了它們根本不具拉卡托斯所指稱的共同硬核。這代表新現實主義與古典現實主義乃是分屬不同版本的兩個家族，不能以研究綱領的角度來評斷何者是進步或是退步。拜行為主義之助，華爾茲領軍的新現實主義在八零年代之後繼承並取代了古典現實主義的位置，如果這是一種科學革命，我們能夠說古典現實主義已經如科學史中的許多學說被淘汰而棄若敝屣了嗎？如果新現實主義因之成為國關理論中的新典範，我們能夠說現在的國關學科中已經進入常態科學時期了嗎？就理論的發展與實際的情形來說，上述的觀點都是站不住腳的，古典現實主義非但沒有消失在歷史中，更因為新現實主義本身的缺陷而重新獲得重視，不管是「新古典現實主義」(Neo-classical Realism)，或是「現實建構主義」(Realist Constructivism)等理論版本，在某些程度上依舊受到古典現實主義的影響。⁴²而新現實主義也並沒有成為所謂的新典範，因為在此同時，自由主義的血脈(新自由主義)、建構主義及同夥(其他後現代主義理論)也都佔有了部分空間。就如同古典現實主義之於理想主義、馬克思主義，國關學科中向來都是百家爭鳴、各領風騷，從來

⁴² Steven E. Lobell, Norrin M. Ripsman and Jeffrey W. Taliaferro, eds., *Neoclassical Realism, the State, and Foreign Polic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Samuel Barkin, *Realist Constructivism* (Cambridge, U.K.;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沒有如同自然科學中的典範可言，再度印證了社會科學不能隨便套用科學哲學理論作為背書。

近來，一些年輕的國關學者也開始積極引進後設理論，如 Chernoff 爲了抵抗典範間的不可共量性、「理論的不可限定說」(underdetermination of theory by evidence)，以及許多詮釋學所帶來的懷疑論觀點，而積極提倡因果約定論(casual conventionalism)。因果約定論承認道德與規範性的論述可以與行爲主義並行不悖，他認爲此足以提供國關理論在理性與人性兩方面之間的和諧，這種方法論上的多元主義也會帶來國關學科的進步與預測外交政策的可行性。⁴³又如 Käpylä 與 Mikkolab 主張以「批判實存論」(critical realism)做爲探索世界政治的後設理論，並應該要以其中的「真理符應論」(correspondence theory of truth)爲架構，也就是探索真理與事實之間的相符程度，這是一種確認外在實體的方式。如果一個假設命題能符合事實，那麼它才是真的，反之亦然。他們認爲當下的現實主義者對於權力擴張有著許多錯誤的命題，此乃肇因於現實主義將國際體系中相似的事實，當作是社會的本體，使得他們就此相信自己的定律，卻反而離真理越來越遠。⁴⁴這些努力在在證明了新一代的學者不滿於現狀，試圖要讓國關學界更積極的思考其理論的哲學價值，也讓後起的研究者必須從學科整合著手，向科學哲學與政治哲學取經，以宏遠的視野看待此潮流的發展。

⁴³ Fred Chernoff, *The Power of International Theory: Reforging the Link to Foreign Policy-making through Scientific Enquiry* (New York: Routledge, 2005).

⁴⁴ Juha Käpylä and Harri Mikkolab, “‘Getting Things Right?’: A Reconsideration of Critical Realism as A Metatheory for IR,”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Development*, Vol. 14, No. 4(October 2011), pp. 401-439.

最後，回顧兩個現實主義理論家族的競爭史，可以發現在當時華爾茲的版本雖以科學的姿態成功地吸引了現實主義者的目光與競相投入（甚至造就了新自由制度主義的合成）。然而冷戰的突然結束，對於所謂的政治科學不啻是當頭棒喝，因華爾茲的系統論不能成功的預測結果，讓自然主義者必須重新思索社會科學未來的發展。國關理論研究的前景或許不會如布林(Hedley Bull)的預言：「無限期的停留在就一些根本問題不斷論爭的哲學階段」，⁴⁵但透過對於後設理論的探討，我們才能知道科學無法告訴我們的答案，才能更清楚地瞭解國關學科的本質與嶄新的方向。畢竟，科學真理本身具有歷史性，自然世界或是社會世界都不是靜態而被動的，忽略或刻意放棄科學與哲學之間的聯繫乃是真正造成我們學科退步的主因。這也突顯出一個社會科學所遭遇到的重要議題：下一個研究議程為何？

僅管國關學界尚在摸索當中，極端的自然主義與後現代主義仍舊存在，但已無法左右社會科學的最新發展。事實上，社會科學（包括歷史學）與自然科學之間存在著一條界線，因為社會科學的研究主體與客體都屬同一範疇-即人類，無論如何抽離，主體與客體之間必然存在著相互關係，歷史到處充斥著相對性。即便是在自然科學中，時空環境依然會發揮極大的影響，一些自然科學的假說也不必然擁有精確的預言力，頗為類似歷史學的通則。現今的社會科學正處於歷史進程中，有著以微觀互動為基礎的系統，而系統中的行為者又有內在調適與學習的可能性，可以說是極端複雜的層面，傳統的實證論（行為主義）早已無法滿足研

⁴⁵ Hedley Bull, "International Theory: The Case for a Classical Approach," *World Politics*, Vol. 18, No. 3(April 1966), pp. 361-377.

究的需求。這不是後現代主義追求顛覆的論點，而是實證論者們信奉的科學方法已遠遠落後於當代的自然科學發展，有些以非均衡結構的動力學為分析法的學者，甚至相當強調對於歷史的依賴。這正反映了國關學科中古典現實主義（應該再增添英國學派）的理論版本確有其價值存在，值得我們重新審思。

（收稿：100年07月26日，修正：100年11月11日，接受：101年12月01日）

參考文獻

中文部分

專書

倪世雄，*當代西方國際關係理論*（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1 年）。

陳瑞麟，*科學理論版本的結構與發展*（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04 年）。

專書譯著

李暉、孫芳譯，Hans J. Morgenthau 著，*國家間政治：為了權力與和平的鬥爭*（海口市：海南出版社，2008 年）。

周寄中譯，Imre Lakatos 著，*批判與知識的增長*（臺北：桂冠，2001 年）。

肖鋒，石泉譯，Iver B. Neumann、Ole Wver 主編，*未來國際思想大師*（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 年）。

範岱年、紀樹立譯，Thomas Kuhn 著，*必要的張力*（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 年）。

英文部分

專書

Barkin, Samuel, *Realist Constructivi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 Buzan, Barry & Richard Little, *International Systems in World History: Remaking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 Buzan, Barry Charles Jones & Richard Little, *The Logic of Anarchy: Neorealism to Structural Realis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3).
- Chernoff, Fred, *The Power of International Theory: Reforging the Link to Foreign Policy-making through Scientific Enquiry* (London: Routledge, 2005).
- Elman, Colin & Miriam F. Elman, "Introduction: Appraising Progres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in Colin Elman and Miriam F. Elman, eds., *Progres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ppraising the Field* (Cambridge: MIT Press, 2003), pp. 1-20.
- Gerring, John, *Social Science Methodology: A Criterial Framework*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 Keohane, Robert O., "Theory of World Politics: Structural Realism and Beyond," in Robert O. Keohane ed.,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State Power: Essay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89), pp. 35-73.
- King, Gary, Robert O. Keohane & Sidney Verba, *Designing Social Inquiry: Scientific Inference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 Little, Richard, *The Balance of Power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Metaphors, Myths, and Model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 Lobell, Steven E., Norrin M. Ripsman & Jeffrey W. Taliaferro, eds., *Neoclassical Realism, the State, and Foreign Polic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 Morgenthau, Hans J., *Scientific Man vs. Power Politics*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46).
- Smith, Steve, "Positivism and beyond," in Steve Smith, Ken Booth and Marysia Zalewski, eds., *International Theory: Positivism and Beyon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11-44.
- Smith, Steve, "The Self-Images of a Discipline: A Genealog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in Ken Booth and Steve Smith, ed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Toda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5), pp. 1-37.
- Turner, Stephen, "The Importance of Social Philosophy to Morgenthau and Waltz," in G. O. Mazur ed., *Twenty-Five Year Memorial Commemoration to the Life of Hans Morgenthau* (New York: Semenenko Foundation, 2006), pp. 174-193.
- Vasquez, John A., "Kuhn or Lakatos? The Case for Multiple Frames in Appraising IR Theory," in Colin Elman and Miriam F. Elman, eds., *Progres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ppraising the Field* (Cambridge: MIT Press, 2003), pp. 419-454.
- Waltz, Kenneth N., "Political Philosophy and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W. T. R. Fox ed., *Theoretical Aspect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diana: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1959), pp. 51-69.
- Waltz, Kenneth N., "Reflections on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 Response to my Critics," in Robert Keohane ed., *Neorealism and its*

Cr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 323-345.

Waltz, Kenneth N., *Man, the State and War: A Theoretical Analysi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1).

Waltz, Kenneth N.,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Reading: Addison Wesley, 1979).

Wendt, Alexander,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期刊論文

Bull, Hedley, "International Theory: The Case for a Classical Approach," *World Politics*, Vol. 18, No. 3(April 1966), pp. 361-377.

Elman, Colin & Miriam F. Elman, "How Not to Be Lakatos Intolerant: Appraising Progress in IR Research,"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46, No. 2(2002), pp. 231-262.

Jervis, Robert, "The Future of World Politics: Will It Resemble the Past?"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6, Issue 3(Winter, 1991-1992), pp. 39-73.

Käpylä, Juha & Harri Mikkola, "'Getting Things Right?': A Reconsideration of Critical Realism as A Metatheory for IR,"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Development*, Vol. 14, No. 4(October 2011), pp. 401-439.

Krishna, Daya, "The Self-Fulfilling Prophecy" and the Nature of Societ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36, No. 6(1971), pp. 1104-1107.

Schuett, Robert, "Classical Realism, Freud and Human Nature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History of the Human Sciences*, Vol. 23, No.

2(April 2010), pp. 21-46.

Wæver, Ole, "Waltz's Theory of Theor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23, No. 2(June 2009), pp. 201-222.

Waltz, Kenneth N., "Realist Thought and Neo-Realist Theor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44, No. 1(Spring/Summer 1990), pp. 21-37.

Waltz, Kenneth N., "The Origin and Prevention of Major Wars,"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 Vol. 18, No. 4(Spring 1988), pp. 615-625.

Weber, Cynthia, "Good Girls, Little Girls, and Bad Girls: Male Paranoia in Robert Keohane's. Critique of Feminist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Millennium*, Vol. 23, No. 2(1994), pp. 337-349.

Thought and Application of Meta Theory in the Disciplin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 example of Morgenthau's and Waltz's Realism Theory Version

Hsu, Lucian, T. H.

(Ph. D Candidate, Graduat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and Strategic Studies, Tamkang University.)

Abstract

It's a common situation to be unfamiliar with meta-theory in the disciplin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lso, to misunderstand meta-theory is also influenced the progress of the IR theory. To correct these defects, this paper, first, will analyze and criticize the traditional philosophy of science systematically. Then, this study intends to introduce a new philosophy called Theory Version as the criterion of IR theory. Unlike Lakatosian research programs, the Theory Version denies the existence of the "hard core". It prefers Kuhnian paradigm but avoids the relativism. The Theory Version aims to explain not only the change and succession between theory and theory but the competition among theory families. According to this, the theory version of classical realism is not the same as the one of neorealism. From the principle to methodology, they have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Neorealism becomes a new prototypical version and thus attracts the research community to follow; moreover, it belongs to the theory family not like classical realism's. Briefly, neorealism's rising is not so-called paradigm shift under the framework of realism.

Key words: meta-theory ; philosophy of science ; Theory Version ; Classical realism ; Neorealism